上古汉语中“我”“吾”之比较

——兼谈单音词研究的五个平面

邹秋珍, 胡伟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广东广州, 510440;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广东广州, 510006)

摘要: 根据语言的经济原则, 一种语言中也不应该有两个功能完全相同的人称代词, “我”和“吾”的区别是代词研究的热点问题。在三个平面理论的基础上, 首次提出单音词研究的五个平面。对单音词分析既要区分文字、语音、语义、语法、语用这五个平面, 又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从文字、语音、语义、语法、语用五个平面考察了上古典籍中第一人称代词“我”“吾”, 比较了它们的发展变化, 对前人时贤的一些说法提出了不同意见。

关键词: 上古汉语; 第一人称代词; “我”; “吾”

中图分类号: H1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0)06-0171-05

单音词研究中, 如果能全面地、系统地从文字、语音、语义、语法、语用五个平面展开研究, 能够深入地解决许多问题。下面我们尝试从五个平面的角度来比较上古汉语中的“我”和“吾”。

王力先生说: 如果说毫无分别的两个人称代词在一种语言中(口语中)同时存在, 并且经常同时出现, 那是不能想象的^[1]。根据语言的经济原则, 一种语言中也不应该有两个功能完全相同的人称代词。作为上古最常见的两个人称代词“我”和“吾”, 二者有哪些区别呢?

一、文字平面

这两个第一人称代词并不在一个历史平面上。在殷商时代只有“我”, 到了西周时代才有“吾”, 但是很少见。

“我”是假借字, 作本义用是象形字, 像一种武器。甲骨文的“我”是独体字, 右边如戈形, 其左有三齿, 是一种像戈的武器或刀具。“我”是兵器, 最初为王国维提出, 今古文字界多用其说, 而郭沫若则认为是锯。“我”是出现时间最早的第一人称代词, 在甲骨刻辞中已有用例。《尔雅·释诂》: “印、吾、台、予、朕、身、甫、余、言, 我也。”以“我”为通名诠释别的人称代词, 可知“我”在上古属于高频词。

“吾”是五和口的组合, 是个形声字, 从口五声。

“吾”出现时间较晚, 甲骨文中未见, 在西周时代, 这个词还没有进入共同语, 所以它仅在《周易》中出现一次, 并未见于其他地域的文献。《尚书》中有两个“吾”都是伪古文。郭沫若指出, “吾”在金文中的开始使用在春秋中叶。从先秦的整体来看, “吾”属于高频词汇, 句法功能全面。但在其后的发展中, 由于种种原因, 最终被“我”取代。

“吾”的源头很可能是“印”, “吾”是“印”的变体。“印”“吾”最初都是镐京的方言词, 在西周时代, 这个词还没有进入共同语, 所以它仅在《周易》中出现一次, 并未见于其他地域的文献^[2]。但是到了春秋时代, “吾”出现的频率不但增多了, 而且使用的地域也广泛了。“吾”见于下引各地的文献: 东部的“齐”“徐”; 北部的“燕”“晋”; 中部的“郑”。由这些例子可以看出, “吾”这个镐京方言词, 在春秋时代已经进入了共同语, 因而可以在西部以外地域的文献中见到它。

二、语音平面

“我”的上古音为疑纽、歌部、上声、开口、一等, 其拟音为[ŋai]。“吾”的上古音为疑纽、鱼部、平声、开口、一等, 其拟音为[ŋaŋ]。“吾”的鱼部和“我”的歌部为通转关系。因此王力认为“吾”和“我”同源。二者应是同源的。

还应该指出的是, 第一人称代词和第二人称代词

收稿日期: 2010-04-12; 修回日期: 2010-10-30

作者简介: 邹秋珍(1976-), 女, 江西九江人,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古汉语; 胡伟(1977-), 男, 河南安阳人, 博士, 华南师范大学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古汉语。

在上古语音上有对应关系。“我”与“尔”对应，之所以说两者有对应关系，是因为这两个字的韵部关系密切。“我”的韵部为歌部[ai]，“尔”的韵部为脂部[ei]，歌部和脂部为旁转关系，即两个韵部的韵尾相同，主要元音相近。“吾”与“若”对应，“吾”的韵部为鱼部[a]，“若”的韵部为铎部[ak]。鱼部与铎部、鱼部与铎部是对转关系，即主要元音相同，韵尾的发音部位也相同。

三、语义平面

战国时期的语料中，“吾”和“我”都表示第一人称的自称，但二者语义方面还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元赵德在《四书笺义》中说，“吾”是就己而言，“我”是因人而言。也就是说，“吾”基本是说自己，而“我”是对着别人说自己，是相对他称的存在而自称的，但也有说自己的。“我”无论作主语、宾语还是定语，在本句或前后句经常出现与它对应的人或事物，例如：

(1) 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论语·为政》)(“我”与“孟孙”对应)

(2) 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左传·隐公六年》)(“我周”与“晋郑”对应)

(3) 庚辰，郑师入防，未见，归于我。(《左传·隐公十年》)(“我”与“郑师”对应)

而“吾”不管作主语还是定语，经常是说自己本人的情况，不涉及他人(另一方)，例如：

(4)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楚辞·离骚》)

(5) 若受吾币而不吾假道，将奈何？(《吕氏春秋·慎大览》)

当“吾”和“我”同时出现在上下并列句时，“我”仍用于对比，“吾”仍用于自叙。而且，对比经常在前，自叙经常在后。如：

(6) 夫卜梁倚有圣人之才，而无圣人之道；我有圣人之道，而无圣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几其果为圣人乎！(《庄子·大宗师》)

(7) 且子正为名，我正为利，名利之实，不顺于理，不监于道。吾日与子治于无约。(《庄子·盗跖》)

(8) 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论语·述而》)

以上三例中，“我”是相对“卜梁倚”“子”“二三子”而言的，而“吾”是仅说自己的情况。

“我”是因人而言，“吾”是就己而言。当然，这种分别也没有绝对化，有少数地方，“吾”也有自别于他人的意思。例如：

(9) 人之所恶者，吾亦恶之。(《荀子·不苟》)^[3]
但在秦至西汉的语料中，“吾”“我”的这种区别不太明显。

四、语法平面

(一) 殷商、西周时期

殷商语料中只出现了“我”，可以作主语、定语、宾语；没有出现“吾”^[4]。

西周汉语中的“我”没有句法功能的限制，可以作主语、定语、宾语、兼语等。既可以作单数，也可以作复数。王力先生揣测说：在原始时代，“我”字只用于宾位，“吾”字则用于主位和领位，这就是“吾”“我”在语法上的分工^[5]。这种说法不太正确，一是没有注意到“吾”出现的时代晚于“我”，没有出现在原始时代；二是“我”在殷商和西周时期都可以作主语、定语、宾语等，不仅仅只用于宾位。

依据我们的考察，第一人称代词“吾”出现于西周晚期。在《诗经》(雅颂)、《尚书》(周书)、《逸周书》中，虽见不到第一人称代词“吾”，但在《周易》中则可以见到：

(10)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易经·中孚》)

例中的“吾”作主语，是单数，《周易》最终成书于西周末年，从春秋时代“吾”已较常用这一点来看，在《周易》中出现“吾”是可能的。

(二) 春秋时期

据张玉金(2008)统计，春秋时期的“我”用例有378个，“吾”有7个，“吾”的用例全部出现在春秋金文中，而出现在春秋金文中的“我”有33个。从数量上看，“我”的用例远大于“吾”，说明这一时期仍以用“我”为常。

1. 句法功能

春秋汉语中的“我”没有句法功能的限制，可以作主语、宾语、定语、兼语、同位语。“吾”只能作主语和定语。

2. 称数

春秋时期的“我”既可以表示复数，有60例；也可以表示单数，有318例。表示复数的“我”没有表示单数的多，表示复数的“我”主要见于《春秋》之中。春秋时代，“吾”(只出现在春秋金文里的)7个用例都是表示单数的。

(三) 战国时期

战国时期，“朕”已是古语词，“余”和“予”也逐渐萎缩，口语中常用的第一人称代词主要就是“吾”“我”

两个了。据邹秋珍(2006)统计战国时期的语料,“我”出现了1 856次,“吾”出现了2 207次。最能代表战国实际语言情况的战国竹简、帛书等出土文献中“我”出现了62次,“吾”出现了72次。战国时期“吾”的用例显著增加,并且比一直使用的第一人称代词“我”多,占据了统治地位。

1. 句法功能

单用时,“吾”很少作宾语,“我”在格位上没有限制;“吾”主要用作主语和定语,“我”主要用作宾语和主语。既然“吾”和“我”在句法功能方面有些差异,是否可以说“吾”“我”在格位的搭配上就一定呈现某种规律呢?以《论语》和《庄子》为例,“吾”“我”在同句或邻句中的格位分布中,“我宾吾主”有12例,“我宾吾定”有5例,“我主吾主”有9例,“我宾我主”有8例,“吾主吾定”有14例,“吾主吾宾”有6例。这表明,“吾”和“我”二者配合使用时并没有严格的格位搭配规律。战国其它文献中情况也如此。

2. 称数

“我”在战国时期,也没有称数方面的限制,既可表单数,也可表复数。一般的情况是,表复数的比例明显少于表单数的比例。《左传》是个例外,“我”表复数的次数约占其总数的60%左右。这恐怕与《左传》本身的内容有关。《左传》记录的是春秋列国的政治、外交、军事各方面的活动及有关言论,国与国交往或发生战争进行交涉时,说话者以“我”自称,并不代表说话者一个人,往往代表着说话人自己这一方面,如自己国家、自己军队等。所以在这种语境下,“我”经常表示复数。

“吾”在战国时期,没有数的分别,既可以表示单数,也可以表示复数。不过,表示单数的频率大大超过了表复数的频率。以传世文献为例,《左传》中“吾”表复数的约占其总数的20%,《孟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表复数的不到其总数的10%,《论语》《楚辞》使用复数的情况更少,《论语》中“吾”作主语都表示单数,《楚辞》中“吾”几乎所有的用例都表示单数。“吾”表示复数的概率少,大概是因为这些文例中使用复数的场合本来就很少,加上对话的场合多是一对一的,经常找不到使用复数的语境。

(四) 秦至西汉

据胡伟、高倩、杨林青统计,秦至西汉的语料中“我”出现了919次,“吾”出现了1 540次。出土文献语料更能反映当时语言的实际情况,秦至西汉早期的出土文献中“我”出现了4次,“吾”也出现了4次,然而西汉中晚期的尹湾汉墓简牍、敦煌汉简、居延新简中“我”出现了11次,“吾”出现了3次,有可能西汉中晚期以

后的实际语言中“我”用的次数开始多于“吾”。

1. 句法功能

“吾”“我”在句法功能上存在一些差异:单用时,“吾”主要用作主语和定语,较少用作宾语;“我”主要用作宾语和主语,较少用作定语,值得一提的是,在《法言》一书中“吾”“我”使用界限分明,“吾”只作主语和定语,“我”只作宾语和定语,没有交叉混用的现象,这在其他文献中是罕见的。但“我”用作定语的频率在增加,秦至汉初的文献中,“我”作定语频率为7.9%,西汉中晚期的文献中,“我”作定语频率为16.34%,“我”的句法功能更加全面,这也为“我”最终全面替代“吾”打下了基础。

当“吾”“我”同用时,它们的格位搭配关系没有规律性。例如:

(11) 始我₁以为君不₂吾₃知也,今君死而我₄不死,是果不知₅我也;吾₆将死之,以激天下不知其臣者。(《说苑·卷四》)

前两个“我”分别作主语,第三个“我”作宾语;第一个“吾”作宾语,第二个“吾”作主语。另据考察,“吾”“我”同用时有“我宾吾主”“我宾吾定”“我主吾定”“我定吾主”“我主吾主”五种搭配形式。可见,“吾”“我”在同句时格位分布上并没有严格的搭配规律。

王力(1958)说:“当‘我’用于宾格时,‘吾’往往用于主格;当‘吾’用于领格时,‘我’往往用于主格。”从以上分析可知,“我宾吾主”“吾定我主”并没有形成规律。

2. 称数

据我们的考察,西汉时,“吾”“我”都是既能指称单数,也能指称复数,并且称数与语言环境有关。例如统计我们所用的秦至汉初时期的语料得知,“我”的用例中,287次表示单数,55次表示复数;“吾”的用例中,525次表示单数,37次表示复数。胡适(1921)曾说:“‘吾’用于领格,单数为常,复数为变;‘我’用于领格,复数为常,单数为变。”这种看法不符合战国至西汉的语言实际。

“我”和“吾”在先秦时期,格位上是有些区别的:“我”主要用于主语和宾语,“吾”主要用于主语和定语。但在后来的发展中,“我”的功能扩展,在定语这一领域也活跃起来,“我”“吾”分布格局被打破。称数方面,殷商时期的“我”仅指称复数;到了西周,“我”也可以指称单数,而且这种用法越来越常见。由于“我”使用灵活,各项功能愈趋全面,“吾”逐渐成为语言中的多余成分,大概在南朝或更早一些,“吾”被“我”排挤出口语领域。“我”是汉语中起源最早、生命力最强的第一人称代词。

五、语用平面

(一) 交际中的使用

殷商、西周、春秋时期第一人称代词可以较为自由地用于各种关系的交际双方之间。

战国、西汉时期多数用于上对下,用于下对上和平等身份者之间的比例都很低,这表明当时人们已不大接受对一般人使用第一人称代词自称的做法。战国、西汉时期“我”主要用于一般的交际场合,也有一些用于表示责备、命令、遗憾等口气的特殊语境中。“吾”的使用相当频繁,并主要用于上对下的自称(其中包括老师对学生、君主对臣民、妻对妾等种种情况),这类用法除体现一定的交际关系外,“吾”字还适用于不同的交际口气,既有老师与学生的交流中渗透着的温婉,也有君主与臣民的谈话中表现出的平和,当然也不乏长辈对晚辈的责问,不过最后一种情况使用甚少,温婉平和的场合占多数。

(二) 谦敬功能

李开(1984)认为:“与‘我’相比,‘吾’的意义重在自我称说,但这种自我称说又含偃义,‘自傲’义^[6]。朱熹在《楚辞·九章·涉江》下注:此篇‘余’‘吾’并称,详其文意,‘余’平而‘吾’偃也。朱说不妄,战国的‘吾’含偃义,并非虚构。”何乐士(1984)认为,就“吾”“我”的主要倾向而言,“我”表示对第一人称代词的强调和加重语气,“吾”则表示礼貌,有自谦意味^[7]。一个说“吾”有自傲义,一个说“吾”有自谦义,到底哪一种说法更符合战国的语言事实呢?

从使用对象来看,战国语料中,说话者用“吾”“我”自称的界限不明显,不论是老师或学生、上级或下级,有道者或无道者,均能用“吾”“我”自称。如:

(12)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论语·公冶长》)

(13) 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论语·述而》)

(14)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而我犹尸子,吾自视缺然。”许由曰:“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庄子·逍遥游》)

子贡对师长、孔子对弟子、尧(上级)对许由(下级)说话,一会儿以“吾”自称,一会儿以“我”自称,如果说“吾”有自傲义,那子贡对孔子、许由对尧是不会用“吾”自称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吾”是没有带任何谦敬意义的。

如果说“吾”带有自谦义,可能在《左传》某部作

品中是如此,这一点何乐士在“《左传》的人称代词”一文中描写得很详细:(一)“吾”常与“闻之”构成习惯语。“吾闻之”,似有表示谦虚的意思。(二)“吾”在对话中,常与“子”相对而言,“子”表示对对方的尊敬,“吾”则表示自身的谦虚^[7]。但是,“吾”在《左传》中所具有的自谦义,在同时代的其它作品中并没有明显的表现。甚至在说话者极端气愤或盛怒之时,仍以“吾”自称,如:

(15) 静郭君大怒曰:“划而类,揆吾家,苟可以慊剂貌辨者,吾无辞为也!”(《吕氏春秋·季秋纪》)

(16) 公怒曰:吾闻见人主者梦见日,奚为见寡人梦见灶?”(《韩非子·内储说上》)

而且,那种以“子”表示尊敬、以“吾”表示自谦的“吾”“子”的搭配方式,在战国其它文献中并不多见。而以“我”“子”的搭配形式反倒常见。同时,“子”和“我”并没有上文所谓的感情色彩。如:

(17) 子以玉为宝,我以不受为宝。(《吕氏春秋·孟冬纪》)

(18) 子加之戈,我加之国。(《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可以说,“吾”“我”在没有明显的谦敬意义上的差异。至于“吾”在《左传》中表现出来的自谦义,只是个别现象,可能是语境或者含“吾”的短语本身,让人有此感觉,这并不代表当时的语言实际。

我们又调查了秦至西汉的语料,认为秦至西汉时的“吾”“我”也不具有谦敬功能^[8-9]。原因有两点:首先,从使用对象来看,在秦至西汉的语料中,不管其社会地位或政治地位的高低,均可用“吾”“我”自称。其次,从说话双方地位的相对尊卑来看,不管是上对下,还是下对上,均可自称为“吾”“我”。

六、单音词研究的五个平面

在单音词研究中,从文字、语音、语义、语法、语用五个平面展开研究,可以全面深入地研究问题。文字平面可以从文字形体等多方面详加考察,找出单音词的源头,与当时社会生活的联系等。语音方面可以从古音的角度考察该词,找出与同源词的关系等。语义方面既要研究单音词本身的语义,也要深入研究单音词在句子中的语义。语法平面可以对单音词所在的句子进行句法分析,可以对句法结构内部词语与词语的关系进行成分分析,可以对句法结构内部的词语与词语之间的层次关系进行分析,也可以对句法功能、称数等方面进行分析。语用偏重于讲表达,是一种动

态的分析, 语用平面可以研究怎样运用单音词组成的句子进行交际, 可以从交际用途、表达功能、主题、评论、表达重点、焦点、口气等方面研究。文字、语音、语义、语法、语用这五个平面有区别又有联系。对单音词分析既要区分这五个平面, 又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单音词研究要形式与意义结合, 描写与解释结合, 静态与动态结合。

致谢:

本文在张玉金教授精心指导下完成, 高倩、杨林青参与了前期研究, 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参考文献:

[1] 王力. 汉语史稿[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8: 261.

- [2] 张玉金. 西周汉语代词研究[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21-36.
- [3] 邹秋珍. 战国时代人称代词研究[D]. 华南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未刊稿: 10-35.
- [4] 张玉金. 殷墟甲骨文代词系统研究[A]. 文史第42辑[C].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42-43.
- [5] 王力. 汉语语法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44.
- [6] 李开. 战国时代第一人称代词“我”“吾”用法种种[J]. 南京大学学报, 1984, (3): 30-36.
- [7] 何乐士. 《左传》的人称代词[A]. 古汉语研究论文集(二)[C].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84: 10-20.
- [8] 高倩. 秦至汉初第一、第二人称代词研究[D]. 华南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未刊稿: 5-15.
- [9] 杨林青. 西汉中晚期人称代词研究[D]. 华南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未刊稿: 6-20.

The comparison of “Wo” and “Wu” in antiquity Chinese

ZOU Qiuzhen, HU Wei

(Guangzhou University China Soft Software Institute, Guangzhou 510440, China;
Academ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economic principle of language, any personal pronoun with tow different functions should not be found in a language. The pronouns-“Wo” and “Wu” constitutes a hot issue. In the three planes based on the theory, this paper first proposed the five planes of monosyllabic words. From the text, voice, semantics, syntax, pragmatics examines the ancient literature of five planes in the first personal pronouns “Wo” and “Wu” to compare changes in their development, when the Yin to correct some of the previous statement is biased, and draw valuable conclusions. An analysis of monosyllabic words is necessary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ext, voice, semantics, syntax, pragmatics five planes, helping to see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hem.

Key Words: Ancient Chinese; the first person pronoun; Western Han; “Wo”; “Wu”

[编辑: 汪晓]